**南 开 大 学**

本 科 生 学 年 论 文（设 计）

**中文题目：后结构时代文本理论中主体的解构与重构**

**——以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分析为中心的考察\_**

**外文题目：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in the text theory in post-structure era**

**--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semiotic analysis of Roland Barthes**

 学 号：\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_

年 级：\_\_\_\_\_\_\_\_\_\_\_\_\_\_\_\_

专 业：\_\_\_\_\_\_\_\_\_\_\_\_\_\_\_\_

系 别：\_\_\_\_\_\_\_\_\_\_\_\_\_\_\_\_

学 院：\_\_\_ 哲学院\_\_\_\_\_

指导教师：\_\_\_\_\_\_\_\_\_\_\_\_\_\_\_\_

完成日期： \_ 2020.4.29 \_\_

摘 要

在文本理论视角下，作者这一主体作为相对于被人所操纵的“语言”的结构中心的消解，体现了后结构主义将结构主义所关注的“形构”逐步解构的过程，拉康与福柯等人都对作为主体的作者进行了基于不同立场的解构。本文试图通过考察罗兰·巴特在文本理论角度以符号学等形式消解主体的演进，对主体的解构与重构作出纵向的分析。罗兰·巴特首先否定了作者作为主体对文本作品的介入，并以结构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主体的地位。在《作者之死》中，巴特以作者之死的断言取消了作者的主体性。以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消解作者的地位，也意味着取消传统符号学体系中的“能指必定指向某种所指”的意义的预设。巴特将这种对主体的解构与符号学意识形态批判相结合，意图取消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内涵。

文本符号与其作者的关系的演变，也隐喻着结构系统从被解构的超验所指——也即中心——向周围的消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后结构时代的主体在被消解的基础上，从结构的阴影下恢复了理论层面的自由，但仍然要为其自身寻求生存之道。霍尔的“接合”理论将主体的意义暂时固定在能指的链条之中，这为主体重新找回自身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主体之死；符号学；能指；所指；后结构主义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theory,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of the author as the structural center of the language relative to that of the manipulated language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the gradual deconstruction of the "form" concerned by structuralism in post-structuralism. Jacques Lacan and Michel Foucault et al. deconstructed the subject of the author based on different posi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by means of Roland Barthes's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ubject in the form of semio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theory. Roland Barthes first negates the author's involvement in the text as the subject and reinterprets the subject's stat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In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Barthes abolishe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author with the assertion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The analysis of semiotics means to eliminate the status of the author, which also means to cancel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meaning of "signifier must point to a signific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semiotic system. Barthes combine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with the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semiotics to cancel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in the text.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 symbol and its author is also a metaphor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transcendental signification -- that is, the center -- of the structural system. In this context, the subject of the post-structure era, on the basis of being dismantled, recovers the freedom of the theoretical level from the shadow of the structure, but still seeks for its own survival. Hall's "articulation" theory temporarily fixes the subject's meaning in the signifier chain, which provides a possibility for the subject to regain its own value.

**Keywords**: subject; semiotics; signifier; signified; post-structuralism

目 录

[引言 5](#_Toc38827638)

[一、作为主体的作者：逐步隐匿的过程 5](#_Toc38827639)

[（一）理性主体的诞生 6](#_Toc38827640)

[（二）福柯：人之死——反理性主体 6](#_Toc38827641)

[（三）拉康：主体之死——语言学论证 8](#_Toc38827642)

[二、罗兰·巴特对主体的解构：以解构作者为例 9](#_Toc38827643)

[(一)不及物写作：《写作的零度》 9](#_Toc38827644)

[(二)颠覆的作者死亡论：《作者之死》 10](#_Toc38827645)

[三、作者解构之后 11](#_Toc38827646)

[(一)能指的即位与所指的退场 11](#_Toc38827647)

[(二)返回意识形态批判 13](#_Toc38827648)

[结论：后结构时代主体的生存之道 15](#_Toc38827649)

[(一)巴特研究的意义：符号学分析的扩展 15](#_Toc38827650)

[(二)接合：重新回到话语实践 16](#_Toc38827651)

[参考文献 19](#_Toc38827652)

# 引 言

1968年，在《作者之死》中，罗兰·巴特在文本意义上宣判了作者的死亡。这一宣称打破了传统理论中作品、作家、世界与读者四位一体的文学要素论，直接取消了作者在作品面前的主体性。在文学理论领域与后结构主义思想领域，他的宣称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使人们的视野转向了后结构时代的主体与作者。想要重新追寻作者的退隐、定义主体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对巴特及对其产生影响的一系列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学者进行研究与分析。

自80年代开始，巴特的著作被逐渐译介到国内，对巴特的研究也就此开始。国内外对巴特的研究多以传记性的评述与对其思想的文本阐述为主。传记性的作品包括汪民安的《谁是罗兰·巴特》、项小敏的《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罗兰·巴特美学思想研究》等。对巴特思想的具体文本阐述包括陈平的《罗兰·巴特的絮语——罗兰·巴特文本思想评述》、谢龙新的《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体系与叙事转向》等。总的来看，国内对巴特的理论仍然处在分析其作品中具体的思想理论的阶段。

在国外对巴特思想研究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有其同时代人克里斯蒂娃的《语言中的欲望》，在书中，克里斯蒂娃将巴特的地位概括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并指出巴特将意识形态研究与文本实践相结合，对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思想作出了详尽的阐述。

基于上述总结，我们能够看出，关于巴特的研究基本都以其作品为基础，评述其思想的独创性与意义，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以孤立的研究为主，很少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视域下考察其他结构主义者对巴特的影响，也并未以主体的出现与逐步解体为线索，整理结构主义时期思想家对于主体的逐步探问，以及主体在解构的大潮中被消解的过程，同时缺乏进一步对主体去路的反思与重构。本文将主要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进过程入手，围绕主体的解构与重构的问题，系统地分析巴特的主体理论。

# 一、作为主体的作者：逐步隐匿的过程

主体概念的含义一直是人文科学领域中重要的论争对象。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文科学迎来了语言学转向这一重大事件，主体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由在场走向隐匿。相应地，作者在文学理论层面也逐步由绝对在场的中心地位走向被解构甚至消解。

## （一）理性主体的诞生

理性主体的诞生首先建立在主体的显现之上。这涉及到人由探索外在世界向内部自我的转向，古希腊时期的人对外在世界的求知欲远大于对内在自我的好奇，他们习惯于将本源性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加深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因而古希腊哲学将世界的本源视作考察的中心。中世纪神学则将上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将与神的关涉看作最重要的论题。奥古斯丁是将神学与主体性联系起来的枢纽，自奥古斯丁将对自我的感知视为通向“上帝”的真理的重要途径以来，人们逐渐将视线转移回自身。奥古斯丁认识自我的前提是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且将这种主动的意识与人自身分离悬置，将其视为人感知自己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上帝既是反思自我的目的，又是言说与意识自我的中介。一种“内在化的自我指涉”[[1]](#footnote-1)就此与表层的自我区分开来，形成存在于人自身之中的对立。

笛卡尔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对立，也即“我思”与“我在”的对立。人的肉体在此处工具化，与理性的主体相分离，这种二分致使肉体负责承载思想着的灵魂，理性主体则负责承载知识与思维。与此同时，理性的主体与身体共同构成一般性的人，这意味着主体表现出一种自我同一性。从笛卡尔的主体出发，人类可以依靠理性自我获得一切知识，既有的理论也应当重新被人的理性所衡量。康德将人视作“理性的动物”，同样提高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

## （二）福柯：人之死——反理性主体

1.人本主义理性秩序的解体

理性主体占据主导地位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思潮的外在表现，而福柯在《词与物》中所宣扬的“人之死”，则代表了当时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涌现，也意味着人本主义理性秩序的解体。《词与物》的副标题是“人文科学的一种考古学”，这体现出福柯旨在考察一种“秩序的历史”，对知识的获取形式进行历史化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介于人们既有的知识经验体系与对这种体系进行反思的哲学范式之间。

福柯认识到，在笛卡尔到康德的进程中，人文科学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全然忽视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理性的至高无上使得人类学的主体主义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正是福柯所质疑的对象。福柯所谈论的“词”——也即话语，与“物”——也即物质客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意在考察将人类理性自身排除在外的话语实践体系。这种排除是基于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否定，关于主体的知识与语言在话语的实践过程中超越人的主体本身，使主张人类中心论的人文科学受到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等反人文科学的抨击。事实上，福柯指出，理性主体从显现到消解的根源，都在于西方理论系统所使用的“知识型”的更替，随着传统知识型的消失，人本主义的理性秩序也在逐步走向瓦解。

就结果而言，人作为主体，在经验秩序系统中的地位被消解了，正如福柯在《词与物》最负盛名的最后一段中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2]](#footnote-2)

2.解构作者与言谈中的权力

回到具体的文本理论上，作者代表一种历史性的理性主体，解构主体也就是消解作者。在《什么是作者》之中，福柯首先明确地将作者的概念简化为一种“讲述的功能体”，用以“说明某些讲述在社会中存在、流传和起作用的特点”[[3]](#footnote-3)，而不是个人化的特殊个体，这种简化致使叙述着的作者主体被解构。对于这一解构，福柯以四个特点将其与其他解构方式区分开来：首先，作者这一形式的合法性事实上由传统的法律所构建和规定，也即“一种特殊类型的财产形式”[[4]](#footnote-4)；其次，作者作为文本的创造者，却又并非总被文本所需要，作者的功能性缺乏时间上的普遍性；再次，作者的构成是一种“复杂操作的结果”[[5]](#footnote-5)，它的形成经由多种层面的批评与反思，而不是作者个人自发的创造构建出来的概念；最后，作者的功能性介于作者与叙事者两者之间，“同时产生几个自我……它并不纯粹而简单地指一个实在的个人。”总的来看，福柯的作者理论意在建立一个遵循话语体系的功能型作者形象。区别于传统的语言概念，福柯的话语——或称言谈，是一种语言的实践活动。福柯要求颠覆权力操控下的话语，而作者是权力的载体与形式。

无论是对主体的直接消解还是文本理论模式下对作者的消解，福柯的理论意图通过批判既有的主体来为言说的“我”制造空间，使其从权力关系的简单运作下脱离出来，不再是权力运作的简单产物，这首先为解构主体、重归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了合理性。

## （三）拉康：主体之死——语言学论证

1.推延的能指

拉康是第一位直言主体之死的思想家。拉康首先从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将主体置入语言系统来进行消解；同时，他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指出主体与他者在无意识领域的关系，以此完成主体之死的论证。

承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拉康对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符号链条进行了改造。从索绪尔的所指/能指表达式（signifie/signifiant）出发，拉康提出了能指/所指——Signifiant/signifie的表达式，以大写的S代替了能指的小写s，这一改写意在强调能指的地位高于所指，将能指上升到绝对的优越地位。随着能指与所指原本平衡关系的断裂，主体也出现了自我的分裂，拉康认为，主体被分裂为言说者、作者与理想我——“他者”，真实存在的主体仅仅能以能指的形态出现。同时，由于能指地位的提升，主体所陈述的所指无法在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系统中固定下来，只能被推延的能指所表述。换言之，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所指的在场形态是不确定的，主体性无非是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表述。

2.无意识的作者

在精神分析领域，拉康通过重新阐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将语言的地位提升到无意识之上，强调“主体的无意识就是他人的话语”。在他者对主体进行观照之时，主体的自我才得以显现。在拉康的解构下，主体的中心位置被化解了，而主体在无意识下所想象出的自我，才是与他者真正交流的对象。

基于拉康将主体去中心化的尝试，作者这一文本写作的主体也被化解了，作者的创作活动一向被认为是作者主动的有意识行为，与作为他者的读者之间的交流实践。而在拉康的语境下，这种交流被更替为作者的无意识自我与作为“他者”的读者之间的交互，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动思维过程不再是有意义的。拉康的主体之死理论，使得文本理论研究开始转向主体性问题，为巴特提出“作者之死”奠基。

# 二、罗兰·巴特对主体的解构：以解构作者为例

在福柯与拉康的主体消解观基础上，从《写作的零度》到《作者之死》，罗兰·巴特首先对作者以至主体进行了主动的解构。从隐晦地指出文本的意义大于作者到直言作者的死亡，同时体现出巴特的主体观念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使得主体被更为彻底地解构。

## （一）不及物写作：《写作的零度》

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对作者关涉文本的“介入”关系作了详尽的考察。萨特在开篇即提出“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的问题，并通过对“介入”与“自由”的论述，陈述了一种自由写作的模式，在此间提高了主体的地位。萨特认为，散文作者是使用文字的主体，在散文的创作过程中，作者与外部世界达成了交互，因而他的创造物的文本都关涉社会的真实存在。散文作家以创作散文的形式参与到世界当中，形成与读者的交流和对外部世界的介入。同时，萨特说明，这种介入的目的应当是获得“自由”，作者要求读者以真实的方式自由地阅读，读者则同样把这种要求加诸于作者。

尽管萨特宣扬自由的写作、声称人在创作中能够通过挑战自我来实现真正的自由，但在罗兰·巴特看来，萨特并未在《什么是文学》中说明真正的介入的文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萨特并未真正规定一种写作的形式。写作（ecriture）是贯穿巴特理论的重要概念。巴特反对萨特所描述的作者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介入关系，提出“不及物的写作”与“及物的写作”。巴特指出，及物写作是目的性极强的功利写作，重视写作的内容；相对地，不及物写作是中性的写作，它更加重视作品之中语言的形式与结构，这既凸显了语言符号的重要性，也将作者的主动性与地位消解了。在不及物的“零度写作”之中，作者的写作不是有意识写作，也不是思想的表达，文本仅仅表达其本身的意义。

从《什么是文学》到《写作的零度》，巴特的作者与主体论通过反驳存在主义论点完成了向结构主义的转捩。存在主义的作者理论同意作者的主导地位，重视主体与外界的交互介入，将写作视为一种对世界的普遍关怀。结构主义的作者理论则试图提升语言的地位，语言符号在这一体系中主动地控制了作品本身，成为作品实质上的主宰，作者不再是具有决定权的主体，世界作为对象也相应地被取消了。

## （二）颠覆的作者死亡论：《作者之死》

1968年，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直言：“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6]](#footnote-6)这种死亡并不意味着对某一个个体宣判死亡，而是将作者作为对象进行整体的消解。他指出，作者的疏离“不仅仅是历史或写作行动，它还完全改变着现代文本。”[[7]](#footnote-7)在“相信作者的时代”[[8]](#footnote-8)，作者拥有创造文本、养育文本的时间上在先的地位；而到了现代，作者与文本同时诞生，时间上不再有先后之分，写作也不再是作者的造物，而不过是言语行为本身，“这个领域中除了语言本身以外，至少没有其他起源”[[9]](#footnote-9)。

为了解构作者，巴特设立了两种形式的对立：首先，作者与语言结构成为一组对立的范畴，话语本身代替了作者，成为文本自身的最重要的属性。巴特认为，是语言在写作过程中把握了主体，而不是作者——这一文本写作中的“个例”——把握了语言，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语言占据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文本本身并非一个单一的对象，而是构成一种多维的空间，不同文本之间的交流本身形成新的写作，也即所谓的文本间性；文本间的相互作用也共同构成了文本的全新意义。在文本这样一个开源空间之中，作者的创造性的独特地位被压缩，逻辑上的在先地位也随之消解了。

其次，作者与读者也形成一种对立关系。在巴特看来，“……文本由多重写作构成，来自许多文化，进入会话、模仿、争执等相互关系。这种多重性集中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读者，而不是像迄今所说的，是作者。读者是构成写作的所有引文刻在其上而未失去任何引文的空间；文本的统一性不在于起源而在于其终点。”[[10]](#footnote-10)文本自身不仅拥有全部的意义，并且在读者的接连阅读之中逐步生产出形态各异的派生意义，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文本的意义并不固定在此处，而是在多元化的读者的多元分析中不断流变。排除作者的地位，事实上是解放文本意义的重要手段，这使得文本在不断的被解读中焕发新的活力。

巴特对作者宣判死亡，使作者在阐释上对文本的绝对权威被否认了，也就是说，作者作为作品唯一的中心的绝对统治地位已经终结。就作品自身而言，话语本身的意义代替作者对文本进行的解释，意义不来自于别处而出自语言本身；在对象上，读者身为观察着的他者，取缔了作者，通过他者观察的视角使文本释放出多样的意义。这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共同将作者移除出文学作品系统之中。总的来看，巴特在《作者之死》中，以宣告作者死亡的方式宣布了文本自身具有的再生能力，并就此构建了一个文本结构自给自足、并能够通过读者的反馈进行自我再阐释的体系，将身为主体的作者掩盖在语言形式之下。

《作者之死》的发表，意味着巴特以激进的方式彻底解构了作者的主体性地位。这代表巴特的作者观完成了从结构主义向以解构为主的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作者被解构得更为彻底。

# 三、作者解构之后

从巴特用以反驳萨特《什么是文学》的《写作的零度》，到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创作的《作者之死》，作者作为主体正逐步由绝对在场的中心地位向被解构甚至消失发展。相对于原本被人所操控的语言，作者这一主体——或称结构的绝对中心的消解，代表着后结构主义将结构主义所关注的“形构”逐步解构的演进过程。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能指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而所指的地位下降。当我们将符号学分析置入政治研究的视野中，以将二者结合的形式再次回到巴特的神话学意识形态批判，可以看出这种解构通过取消作者的主体性，为语言的自足创造了空间，因而为解决资产阶级化的古典写作危机提供了一种理论出路。

## （一）能指的即位与所指的退场

1.从所指的下降到主体性的消亡

自索绪尔的语言学框架下发展出的结构主义，事先已有了能指必定指向某种所指的预设，因而也就存在着先验的结构中心，结构所追寻的意义在先验所指这一中心这里得到了最终的解答。换言之，在先验中心在场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体系都拥有其最终意义。

德里达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也即解构主义对这一看法表示反对。德里达指出，西方传统的理论方向总试图以一种科学的结构一劳永逸地对一切形式作出阐释，以一正一反的二元对立与从属关系制造传统意义上的秩序，从而确定在场的意义。在结构主义的语境中，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就表现为，为能指的链条预设一个先验所指，也就是结构的中心。德里达反驳这种秩序化与中心化的努力，并否认符号在这种形式下可以发挥作用。他提出能指与所指的“永无止境的意义的游戏”[[11]](#footnote-11)。在能指与所指的嬉戏之中，符号本身不断地被替代与置换，所指的至高无上地位被削减了，能指则占据了主动权。在这一设定之下，预设中的先验所指——结构的中心，其确凿无疑的中心地位被否定，最终成为延展的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巴特的写作观同样展现了后结构主义的特色：文学实践的重心向文学形式也即能指转移，与素材的内容——所指相疏远。高扬语言结构的地位的代价就是，作者作为主体的地位下降甚至消失。此外，巴特将语言与语言结构分离开，指出语言结构是语言实践活动的真正生产者。传统意义上的意义生产者——作者，其一以贯之的中心地位导致人们不再关心文本自身，而转向作者的创作意图、文学批评等衍生的“意义”，而忽略了语言结构自身生产出来的意义。事实上，作者只是“执笔人”，他并不掌握文本的语言结构，只是将文字进行表象上的重组，文本的创造一经完成，作者也就隐匿在语言结构之后。只有取消了作者的主体性地位，语言结构才能进行其自身的意义生产的工作，呈现文本的多层意义。

《作者之死》代表着作者主体性完全被巴特所取消。在文本结构论中，作者曾经占据不容置疑的中心位置，主导作品的产生、负责阐述其派生意义。但在巴特的解构之下，这一主体也作为文本结构的超验所指，消解了中心地位。取消作者的主体性，意味着取消文学结构中的唯一中心。

2.能指链条的无限延展

巴特以后结构主义的眼光对索绪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后结构主义既不认为在能指与所指的体系之下存在一种终极意义，也反驳意义是固定不动的这一观点。在《符号帝国》中，巴特这样陈述：“没有至高无上的所指固定住符号的链条，没有根本性的基础——使得符号极其微妙、自由地绽放”[[12]](#footnote-12)。在后结构主义的观点中，意义是不在场的；但这种不在场并不意味着意义消失，而是由于在不断延伸的能指链条之上，意义是被推延的对象，更是无从确证的他者，也就是德里达提出的“延异”。而已经被提出的意义，仅仅是意义的似是而非的踪迹，与确证的意义之间仍存在着距离。总而言之，意义一经提出，就将会被新的能指视为对象，进入语言结构内部自身进行的意义生成过程。我们永远无法得出一种固定不动的意义，链条在无限延伸的过程中并不达到某个终点，自然也就不存在“终极意义”。

具体到文本理论中，我们能够说，巴特的文本也是不存在意义的。但这同样不代表意义的消失，而是由于意义被文本的所指链条延展了。在意义被无限推延的场域中，文本的意义无从固定。因而，文本的意义既是在场的又是缺席的，同时表现出存在与不在；基于这种并不固定的流变，文本的意义才拥有了不受限制的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能指链条的无限延展建立在主体性被取消的基础之上。巴特的作者之死理论将作者这一主体清除到文本内容之外，那么作者作为原本的表层上的创作者，不再拥有为文本的意义定名的权力，这使得文本的意义进入无限生成的循环过程之中，成为众多能指的各自延伸，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巴特认为，这种碎片化形态才是文本分析与解读的良好生态，文本自身并不将自身限制在某一种意义的桎梏之中，而是要求被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意义。将作者的主体性取消，这意味着文本置于语言形式自身结构化的再生产与读者的观照之中。只有将意义在能指的链条上无限延展下去，文本才能够表现出真实的意义，即使这种意义并不能被固定在某一能指处，却代表了文本内部真实的状况。

此外，在符号学内部批判的基础之上，巴特在将政治的意识形态批判与符号学分析相结合的方面也作出了尝试。这需要我们回到巴特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之中，对巴特的符号学与文化批判理论进路进行整体的把握，并由此理解巴特的主体观。

## （二）返回意识形态批判

1.神话学批判：颠覆结构的意图

巴特将自身的理论分为四个阶段：符号学的理论研究、结构主义文艺理论、“文本”研究与片段式写作。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巴特已经以符号学的方式对大众文化的意义进行了否定与更迭。返回《神话》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巴特的主体观从表层的湮灭到深层的取消的过程，以符号学的方式重构主体在巴特意识形态批判中的地位。

在《神话》中，巴特首先指出，神话是一种言谈方式。这里，巴特将物质本身与其被赋予的社会意义与用途分离开，将物质被赋予意义的过程视为写作的过程。有别于巴特的文学理论，这一符号学与语言学转向的尝试将日常生活置入符号学分析的视域中，将言谈与话语这一形式覆盖到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之上。

我们知道，巴特的符号学体系相比索绪尔更进一步，他指出神话是一种第二秩序的符号学系统，将能指称为意义（第一层面的语言）——形式（第二层面的神话）；所指称为概念；符号则被称为意指作用。形式的地位在《神话》中已经高于意义，意义呈现形式，形式则领先意义。神话的言谈在巴特看来是一种“置换后的言谈”，神话的意指作用并不隐藏任何意义，“神话并不隐藏任何事物，它的功能是扭曲，并不是使事物消失。”[[13]](#footnote-13)但这种扭曲在日常生活中被视为是合理的，是“过度正当化”的。在神话的系统之下，神话的读者也自然而然地将能指唤起概念的过程视为理所当然的，所指的地位被合理化，“神话被阅读为事实的系统，然而它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学的系统”[[14]](#footnote-14)。神话以构建能指与所指之间显见联系的形式，将政治“纯化”，建立一个纯然自然发生的、“没有矛盾的世界”，从而达到将本来充斥着意识形态色彩的神话去政治化的意图。

巴特意图通过揭露神话的意识形态意味，达到“现实与人、描述与解释、客体与知识间的和解”[[15]](#footnote-15)。巴特认为，我们难以从内部征服人为的神话，只能揭露伪装成神话的意识形态，将神话的结构体系展现出来，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理所应当的关联断开，颠覆既有的神话结构，也就是将神话“去神秘化”。

2.破除古典写作的神话

回顾巴特写作《写作的零度》与《作者之死》的背景，我们发现，巴特之所以要取消作者的主体性，同样是因为在写作领域体察到了神话系统导致的意识形态结构框架。但在对作者的主体性的消解中，巴特更进一步，从将神话去神秘化到对符号系统本身进行彻底的批判甚至推翻，从基于神话学分析的对所指的解构，向直接消灭符号本身发展。

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提出，古典写作正面临危机。之所以将古典写作看作批判的对象，是由于巴特认为，古典写作已经被资本主义的话语所垄断。古典写作也是一种神话学，在此处，神话的所指是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力，能指则是单一的写作本身。在古典写作之中，语言是清晰而明确的，而资产阶级的意图潜藏在清晰的语言之下，通过资产阶级的写作方式表现出来。在古典写作的模式下，语言的作用被简化为表达个人或集体的简单诉求，成为一种为了传达内容而存在的普遍性的工具。而在巴特看来，语言应当是自足的结构，而不应沦为资产阶级自我表达的工具。

为了摆脱古典写作的困境，巴特对作者与主体进行了形式上的消解，也就是零度的不及物写作与宣称作者之死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可以说巴特取消作者与主体的权威地位，同样意在打破结构的框架，破除作者的权力在文本意义上的统治，提升语言系统自身的地位，解决古典写作危机的尝试同作者与主体的消解互为因果。

综上所述，巴特的文本理论中消解作者的主体性，具有一定的去意识形态内涵。正是由于意识到资产阶级写作导致的古典写作缺陷，巴特进行了一系列高扬言说自身、否定主体意义的尝试。巴特的目的是通过批判古典写作，批判作者的显见与主体的中心位置，使得语言重新找回自身的活力，不再被外界条件控制。在这一批判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古典写作神话被语言自身所破除，文本的意识形态意义也就自然地被消解了。

# 结论：后结构时代主体的生存之道

随着巴特的作者之死理论中文本符号与其作者的关系的演变，隐喻着结构系统自被解构的超验所指——也即中心，向周围的消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后结构时代的主体在被消解的基础上，从结构的阴影下恢复了理论层面的自由，但仍然要为其自身寻求生存之道。

## （一）巴特研究的意义：符号学分析的扩展

巴特的文本研究开创地指出“作者之死”，这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暂且不论这一研究在文学领域的重大意义，而从其对主体性的取消与对意识形态的重构的角度分析巴特学说的重要性。

首先，巴特对主体性的取消在文本的意义上具有开创性。取消主体的言说自结构主义以来始终甚嚣尘上，而巴特的独创性在于，他首次论说作者的死亡，并进一步以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话语对作者的主体性进行取消，这在传统以作者为中心的文论体系中引起轰动的讨论，也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范畴扩大到文本研究的领域。

其次，巴特将符号学批判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相结合，使得主体之死在意识形态的场域发挥意义。巴特的神话学批判揭露了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作者之死的理论将这一揭露的范围扩大了。究其根源，巴特的批判将消解话语的权力与取消作者的主体性结合起来，这一结合对于主体的理论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自巴特宣称作者之死以来，产生了众多对主体各具特色的解读，例如福柯延续了巴特的文本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作者之死，提出作者是承载权力的主体形式，解构作者的地位就是将权力消解的过程。

总的来看，巴特的研究在符号学与文本理论两个层面都构成了理论范围的扩展，将符号学分析置入文本系统，也从文本理论的角度丰富符号学分析的内涵。就结果而言，巴特的努力使结构的权力中心被取消，原本被指称的对象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为破除结构的统治、消解话语结构的权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巴特的作者死亡论仍然存在着理论漏洞，包括单论作者之死而忽视了读者的地位、写作过程中的主体在作者之死之后应当处于什么地位等难以阐释的问题。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指出，巴特等后结构主义者颠覆作者的行为，使得读者、对话者与听众的地位同时被抹杀掉了。此外，晚年的巴特自身也采取了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立场，他提出“新写作实践”[[16]](#footnote-16)，将写作视为一种自我追寻真理的过程，这就使得他必须要重新面对文本中的“我”，并重新赋予主体以地位：“自相矛盾的是，为了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他必须言说我，即将自己作为他者于他便是一切的人来言说”[[17]](#footnote-17)。在这里，我们主要探究作者死后主体何为的问题，试图为被消解的主体重新找回参与话语实践的理论根基。

## （二）接合：重新回到话语实践

在主体消解、中心移除之后，主体在解构的视野中无从寻求自身的意义。尽管巴特对文本的去意识形态作出了努力，但却没有解决主体自身的去向问题。由霍尔所提出、并由拉克劳扩展的接合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主体以容身之所。

接合理论的背景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的还原论与本质论的困境。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依赖经济还原论与阶级还原论这两种相互关联的还原论。还原论将一切文化现象返回生产方式与阶级，试图说明文化与物质生产与阶级条件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说法将文化现实简单地归因于从属物质结构的支配中，对于产生于新的社会关系的文化现象而言，还原论的论述并不能解决其问题。面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理论困境，霍尔等人引入了众多意识形态分析的文化主义理论资源，其中就包括巴特的神话学分析，并最终提出接合这一理论来解决还原论的困境。

接合（articulation），字面上的意义是不同要素之间相互连结、共同构成以一个统一的整体。霍尔指出，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18]](#footnote-18)这意味着，接合并不是永恒固定的过程，它意在基于将不同要素相关联的动作，迫使人们观察这些要素的差异与同一，这就将还原论把一切文化现象固定地指向物质解构的做法破除了。

接合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接合理论建立在话语的言说实践的基础之上：“接合的范畴取得了不同的理论身份地位，接合现在是一种言说的实践……在组成成份内部建立一种关系的任何实践称为接合。”[[19]](#footnote-19)因而，拉克劳和墨菲尝试在理论图景中强调话语言说的重要性，而霍尔对于强化话语的地位则持批判的态度。霍尔指出，将一切的社会实践与话语实践相等同是混淆了“是（is）”与“像（like）”，将作为比喻的话语体系与实际的实践相等同，这导致话语的地位被不客观地提升，从一种经济与政治的还原论转向另一种话语的还原论。霍尔在重视实践中的话语的同时，也强调实践本身的重要地位。在这一意义上，霍尔将接合理论从文化主义的立场过渡到物质实践中去。接合理论将文化研究范式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体系相结合，为多种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彼此碰撞提供了途径。

接合的过程事实上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接合、解接合、再接合的动态过程。在这种动态运动中，意义得到暂时的固定。诸如葛兰西的霸权与反霸权等理论，接合理论意在说明霸权不是单纯的统治，而是一种“创造和维持共识的过程或共同确定利益的过程”。这在事实上为主体提供了重构的可能性。对接合的符号学分析则意味着，在不断延伸的能指链条中，主体得以暂时被固定下来，意义并非时刻处于“延异”的不在场状态，而是在接合的过程之中被暂时关联起来的不同物质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表现出来。区别于先天形成的既有整体，通过接合形成链接的过程是未完成的，换言之，接合理论强调不同要素的结合并非是固定的，而是通过接合的过程将不同的概念同时进行分析，成为一个整体的理论系统，建立“同一中的差异”。

接合理论通过将不同的要素结合起来的方式，为实践活动构建了暂时固定的意义，防止在理论研究之中陷入极端。这就与巴特的主体消解构成了区别，巴特的文本理论使得主体消解、作者不再具有价值，意义成为多维度的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研究的方向走向了相对主义，派生出一切理论分析皆为合理的思想。接合理论对这一相对主义倾向作出了矫正，重新表现出意义存在的可能性。接合概念的意义不仅在于将还原论的传统形态打破，而且还在于在解构主义的话语系统下为主体寻求了新的空间，也在巴特等人对主体单纯的消解之上，为主体的自我解放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 参考文献

[1] [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2] [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

[3] [法]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法]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5]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6] 赵衡毅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7] [德]彼得·毕尔格.《主体的退隐：从蒙田到巴特间的主体性历史》.陈良梅、夏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8]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4月.

[9] 桑明旭.“作者的死亡”与“能指的狂欢”[D].苏州大学,2010.

[10] 范志坚.隐遁的主体 飘散的作者[D].四川师范大学,2011.

[11] 邓丽芝. 语言学转向下“作者死亡论”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12] 左其福.语言学转向背景下作者死亡论的比较考察——以罗兰·巴特和福柯为对象[J].当代文坛,2009(02):52-55.

[13] 李勇.作者的复活——对罗兰·巴特和福柯的作者理论的批判性考察[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01):64-70+96.

[14] 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社会学研究,2000(03):55-66.

[15] 卢毅.当代欲望主体的哲学处境——拉康与萨特学说中的自我、主体与他者[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06):30-38.

[16] 黄晞耘.罗兰·巴特思想的转捩点[J].世界哲学,2004(01):29-42.

[17] 邹威华.斯图亚特·霍尔的“接合理论”研究[J].当代外国文学,2012,33(01):42-49.

[18] 萧俊明.新葛兰西派的理论贡献：接合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2002(02):33-39.

[19] 王轩.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J].智库时代,2018(30):191-192.

[20] 萧俊明.新葛兰西派的理论贡献：接合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2002(02):33-39.

[21] 肖爽，由“编码/解码”走向“表征”——重读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J].文化研究，2017(02):138-149.

1. [德] 彼得·毕尔格：《主体的退隐：从蒙田到巴特间的主体性历史》，陈良梅、夏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footnote-ref-1)
2. [法]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506页 [↑](#footnote-ref-2)
3. 赵衡毅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17页 [↑](#footnote-ref-3)
4.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517页 [↑](#footnote-ref-4)
5.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519页 [↑](#footnote-ref-5)
6. 赵衡毅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12页 [↑](#footnote-ref-6)
7.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509页 [↑](#footnote-ref-7)
8.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509页 [↑](#footnote-ref-8)
9.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510页 [↑](#footnote-ref-9)
10.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511-512页 [↑](#footnote-ref-10)
11. 转引自[英]艾伦，导读巴特，杨晓文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7，第83页 [↑](#footnote-ref-11)
12. 转引自导读巴特，第86页 [↑](#footnote-ref-12)
13. [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81页 [↑](#footnote-ref-13)
14.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第191页 [↑](#footnote-ref-14)
15.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第220页 [↑](#footnote-ref-15)
16. [德] 彼得·毕尔格，《主体的退隐：从蒙田到巴特间的主体性历史》，陈良梅、夏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96页 [↑](#footnote-ref-16)
17. 《主体的退隐：从蒙田到巴特间的主体性历史》，第196页 [↑](#footnote-ref-17)
18. Stuart Hall, “*On Post 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Chen(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 in Cultural Studies* , Routledge, 1996, p.141. [↑](#footnote-ref-18)
19. [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尹树广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4月, 第126页 [↑](#footnote-ref-19)